

XIAMEN DE ZUJIE

厦门的租界

厦门文史资料第十六期



编 委 会 名 单

顾 问：林 源 王允晓 李金龙

余绪缨 林海水

主 编：陈纹藻

副 主 编：洪卜仁

执行编辑：洪卜仁 江菱菱

编 委：陈纹藻 洪卜仁 许国仁

陈旺火 江菱菱

序 言

林 源

1840年6月，英国政府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对外屈膝投降，这场战争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告终。从1841年8月英军占领鼓浪屿开始，列强竞相争夺鼓浪屿为租地，直至1903年5月，鼓浪屿才沦为“公共租界”。嗣后，厦门人民团结御侮，开展反对殖民统治的英勇抗争，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许多光辉灿烂的篇章。

众所周知，《南京条约》签定以后，厦门被逼开放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但在“五口”中，只有上海、厦门设有“公共租界”。从此，鼓浪屿不但成为西方各国冒险家的乐园，而且是军阀、土匪、流氓、恶霸的庇护所，还是走私、贩毒、赌博、卖淫等等罪恶的渊薮。殖民主义者在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下，无恶不作，横行无忌；而中国人在鼓浪屿触犯殖民主义者制定的所谓律例，却要被工部局的巡捕抓送会审公堂治罪。各国领事无视中国的司法权，凌驾于会审公堂之上，干预审判，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却莫奈之何！

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遵照周恩来总理“把亲身经历留下来”的指示，自1959年开展文史资料工作以来，征集并整理过有关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和厦门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官民团

结、收回海后滩英国租界的抗争，以及厦门人民反对将虎头山划为日租界的斗争的资料，都是列强侵略中国的铁证和厦门人民反抗侵略的珍贵材料。

为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配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市政协公开出版《厦门的租界》一书，对于激发厦门人民的爱国热情，振奋精神，把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得更快、更好、更加繁荣，具有现实的意义。

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的革命先辈和先烈们，为求得国家的真正独立和中华民族的解放，100多年来，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跟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像巨人一样，屹立在东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4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世界局势方面，已经发挥而且将继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受屈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珍惜革命成果，振奋精神，艰苦奋斗，共同维护并巩固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局面，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作出更大的贡献。

厦门人民具有反对侵略、反对压迫的光荣革命传统。自鸦片战争以后，厦门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收回海后滩英国租界和阻止虎头山划为日本租界的斗争，就是官民团结，共同对敌取得胜利的写照。100多年来的斗争经验证明：什么时候民族团结，国家就坚不可摧；什么时候民族分裂，国家就要受侵略，人民就要遭殃。我们在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的時候，就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只有全国人民维护团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就无限光明。祖国的统一，中华民族的振兴，就必定会实现。

这本书包含三项主要内容：一、《“公共租界”鼓浪屿》和《帝国主义对鼓浪屿的殖民统治》，前者曾经在《厦门文史资料》第三辑发表过，现经编者加以增删整理，重新发表。二、辑录有关海后滩英国租界的资料。三、辑录厦门人民反对虎头山划为日本租界的资料。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和公开发行，为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的活动，提供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让厦门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牢记帝国主义血腥统治厦门的罪行，缅怀无数革命先烈为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所做出的贡献。

由于本书编辑时间匆促，舛误在所难免，期待读者不吝指正，是所至盼！

目 录

“公共租界”鼓浪屿

一、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	(1)
二、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的经过.....	(5)
三、帝国主义的统治机构.....	(18)
四、中国官方机构与民间社团.....	(23)
五、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	(31)
六、民族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	(39)
七、外国教会、医院、学校和报刊.....	(41)
八、中国人办的文化教育事业.....	(58)
九、慈善机构.....	(65)
十、前仆后继的反帝斗争.....	(67)

附录

一、《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	(73)
二、鼓浪屿工部局律例.....	(79)
三、工部局组织系统.....	(88)
四、工部局1903年至1940年收支一览表.....	(91)
五、历届领袖领事名录.....	(93)
六、历任厦门海关委员、监督名单.....	(94)
七、各国历任驻厦领事名单.....	(98)

八、厦门洋务分局兼会审公堂委员名单	(111)
九、厦门交涉员名单	(113)

帝国主义对鼓浪屿的殖民统治

一、帝国主义者统治鼓浪屿的体系	(114)
二、帝国主义之间的权力争夺	(118)
三、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分子	(133)
四、鼓浪屿人民的反帝浪潮	(138)
五、工部局的《律例》、巡捕及其罪行	(143)
六、工部局的财政与税收	(152)
七、华董、华人顾问和华人行政委员	(161)
八、“公共地界”的保甲制度	(170)
鼓浪屿公共租界事件始末	(178)
《东南日报》关于鼓浪屿公共租界事件 的新闻报道（选辑）	(186)
日本独占时期的鼓浪屿	(196)
海后滩反帝斗争之回顾	(210)
海后滩档案资料选录	(221)
厦门人民反对虎头山划为日本租界的斗争	(231)
厦门日租界交涉案公牍	(239)

“公共租界”鼓浪屿

(1903年—1941年)

张镇世 叶更新
杨纪波 洪卜仁

一、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武装侵占厦门，导致鼓浪屿后来沦为“公共租界”。因此，整理公共租界时期鼓浪屿的史料，必须从鸦片战争谈起。

(一) 英国武装入侵和厦鼓军民的英勇抵抗

鸦片战争发生后，1841年8月25日，英政府派璞鼎查率领战斗舰、巡洋舰、运输舰、粮食舰、测量舰共30艘的一支庞大的舰队，载运3500名英军，突袭厦门。8月26日早上，英国派遣摩底士号和都鲁查号等军舰向驻守鼓浪屿炮台的清军连续发射排炮，炮台守军奋不顾身，痛击入侵的英军。

当英国舰队潜入厦门港外进行侦察时，就已“看见鼓浪屿的人们忙于增筑沙垒”（莱特：《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国商埠志》，1908年）准备抗击。在英舰摩底士号舰长爱尔斯率领英军登陆时，鼓浪屿的军民立即奋起反抗，毫不畏缩。清军游击杨清江虽然身上和面部均受重伤，但仍然坚持指挥，连续几次杀退登陆的英军，直到英军从后面把他砍倒，才停止抵抗。英舰“谦逊号”司令宾汉在他所写的《英军在华作战记》一书里也说：英

军攻占鼓浪屿炮台时，守卫炮台的清军走下炮台，向石子上淬口唾沫，拣起石子砸他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但因众寡悬殊，缺乏救援，鼓浪屿终为英军所占领。林树梅写的《厦门即事》一诗：“经年筹备扼重关，孤注如何一掷间？但看鲸鲵来鼓浪，谁移熊虎守轮山？”（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上册）愤怒地谴责清政府投降派失地辱国的罪行。

英军攻占厦门、鼓浪屿后，四出抢劫，厦鼓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抵抗，迫使英军不敢久占厦门。9月5日，英国舰队起锚北上，留下都鲁查号、卑拉底士号、阿勒琴号等3艘军舰和3只运输船并500名士兵退据鼓浪屿，把炮架设在复鼎山上，用以控制厦门。

英军盘据了鼓浪屿，立即于1842年农历正月初七日（2月16日）以“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兼管驻中华领事署篆璞鼎查”的名义，在香港、定海等处海关，张贴告示：

“为晓示事……闽省厦门港口，被我船据守，凡有各国船只，前往该港之鼓浪屿海面带货买卖者，应蒙我官助祐。凡事属平常者，定必保护妥安，及日后倘或竟有撤回该处兵师，仍应暂俟赴彼各商者俱得机便，带回货物，算清账目，无误也。为此示知遵行，特示。”（《鸦片战争》，第五册）

充分暴露了英国侵略者妄图长期占领的野心。而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居然承认“鼓浪屿仍由英国暂据”。一直等到还清赔款与建立通商口岸后，英军才撤出鼓浪屿。

英军占领鼓浪屿期间，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毁田园，占土地，强行修建营房、炮垒、道路、操场。到1844年，还建立第一座领事楼房，作长期占据鼓浪屿为“英人永久居留地”的打算。1845年初，清政府把第五期赔款还清后，英国驻厦门第二任领事

阿礼国在无可借口情况下，才命令英军撤出鼓浪屿，并把领事署迁往厦门，住在岛上的几个英人，也搬往厦门城内。

（二）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

英国侵略者以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紧接着就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办学，积极从事精神麻醉的活动。1842年2月，英国侵略者武装攻占厦鼓的炮声硝烟还未消失，美国归正教会教士雅裨理就抢先通过璞鼎查的支持，从香港乘坐英舰进入鼓浪屿。2月24日，他一上岸，立即持着璞鼎查的介绍信会见盘踞鼓浪屿英军长官戈贝，商谈设立教会，传播“福音”的事情。

美国归正教会的行动，引起英国侵略者的注意，在1844年和1850年，也先后派遣教士施约翰夫妇和用雅谷前来鼓浪屿创设伦敦差会（又名自由教会）和长老会，与美国教会争夺宗教阵地，他们并各在其势力范围内创办学校，而美国教会则更深入一层，设立所谓“慈善”事业的医院和创办各类学校。

除基督教外，还有天主教设教堂于鹿礁路（它是20世纪初期才建筑的）。教堂的主教和神父都是西班牙人。天主教也在教堂内办了学校。

英美基督教以鼓浪屿为根据地，把势力扩展到闽西南各地，先后设立大小教堂350多所。鼓浪屿基督徒占全岛人口总数的百分比，是全国最高的。

（三）经济掠夺的“五行”和“五关”

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厦门为五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使厦门、鼓浪屿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南京条约》签订不久，厦门就有了五家洋行，人们简称它为“五行”。所谓“五行”，由于设立的时间先后不同，历时久远，虽广泛调查，但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有的说是德记、和记、宝记、合记、协隆，有的说是德记、和记、宝记、瑞记、协隆，前

三行大体没有异议，后两行则未能肯定。“五行”中以英商居多数，其它国籍较少。而英商和记洋行的业务，一直延续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时才告结束。

当时所谓“五行”，都是经营顶盘批发商，除大量倾销舶来品外，还进行不等价交易。以贱价收购我国大宗土特产，转运到我国各埠和外国，垄断牟利。它们的贸易货物有煤油、煤炭、茶叶、食糖、布匹、杂货等，并非法推销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高价贩卖军火给内地土匪，祸害无穷，尤其令人痛恨的是：英、美、法、荷、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还对厦门、鼓浪屿及其周围地区的人民进行拐骗、绑架，私运到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贩卖，而鼓浪屿的“大德记”，则是外国侵略者关闭华工，待船转运出口的大本营。

由于当时海关大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因而外国人得以操纵一切，对出入口货物征税极不公平，多有利于“五行”的剥削。

除了上述“五行”外，还有1858年的英商“厦门船坞公司”以及1876年的“厦门机器工程公司”（址在现内厝沃造船厂）；更有公开售药品，暗中搞贩毒的“屈臣氏大药房”和“主利大药房”（1858年开设）。此外，又有丹麦人经营的大北电报局，也于1869年开始在鼓浪屿田尾西路设立。

与“五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英、美、西班牙、法、德国五国驻厦领事馆，人们通常称它为“五关”。后来西班牙、德国两领事馆先后撤销，由日本、荷兰两领事馆递补。各国领事馆，除直接保护其侨民和籍民外，还在贸易上负检验各该国商船入口与报关（海关）的责任。当时所有外轮（包括悬挂外籍国旗的商船）入港，该轮船长要把放在船上邮箱内的“船牌”（即该轮的注册牌照）连同入港后起卸客货的人数和载单，先送交其所属的领事馆，经该领事馆派员下船检验后，以书面通知厦门海关，由该轮向海关办理“清仓”缴费等手续，待该轮要出港时，方向该

领事馆索回“船牌”。轮船的邮箱除放置“船牌”外，还有载单以及外国机关、商行的临时紧急邮件。

由于各领事馆与海关关系密切，海关每逢“封关”（即休假日停止办公）之前，便用书面通知各领事馆，转达其所属轮船不要在“封关”时间入港。正因为上述五个领事馆实际上是各该国对华经济掠夺的保护机关，所以厦门人民称之为“五关”。

我们仅从鼓浪屿的外国人和洋行的激增，也就可以概见帝国主义是怎样把鼓浪屿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

居住在鼓浪屿的外国人，1847年有20多人，1890年有100多人，而到1909年，更激增达250人之多。外国侵略者对鼓浪屿进行经济掠夺的机构也日益增加，自1873年到1890年间，又先后增设汇丰银行、宝顺洋行、水陆洋行、协隆洋行、旗昌洋行、振昌洋行、美利时洋行、三五洋行、义和洋行、台湾银行、大阪轮船公司等10多家，还有台湾记、广顺、德建、和利以及龙头酒家等五家商店。后来又有瑞记、裕记、安记，以及三达石油公司（又名美孚石油公司，1904年开设）、亚细亚火油公司（1907年开设）、德士古石油公司（1922年开设）。

这些洋行经营的业务范围极广，甚至代理轮船和保险业务，而且还代理支持它们周转资金、操纵市场金融的银行（如德记洋行曾代理渣打、汇丰、国际、台湾、安达等5家银行，和记洋行曾代理有利银行）。

二、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的经过

（一）各国设立领事馆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限定外国人只能在通商口岸的

厦门设行和居住。1856—1860年，英法两国组织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开放天津、牛庄等10个城市为商埠，并给予外国人在我国腹地游历、传教与内河航行等特权。从此，外国侵略者侵入鼓浪屿的，除原有的英、美、法、德、日、西班牙等国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荷兰、丹麦、葡萄牙、奥地利、瑞典、挪威等国的商人，也都蜂拥到鼓浪屿，占据地盘，建造楼房别墅，作为久居之计。截至1865年，据《中华年鉴》记载，鼓浪屿还只有英、美和西班牙三国设有正规的领事，其他国家仅设商人兼代的“领事”，甚至正规的领事也有由洋行经理兼任的。

到了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与居住鼓浪屿的外国人数急剧上升的同时，外国侵略者在鼓浪屿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机构也随着激增。在这个弹丸小岛上，设有领事馆的，从原来3个国家增加为12个国家。分述于下：

英国领事馆：

英国侵略军占领厦门期间，1843年11月2日，即派舰长纪里布担任英国驻厦首任领事，苏里文任副领事，威妥玛任翻译员，温傲斯特朗任领事馆医生。这批人员和英国侵略军一起驻在鼓浪屿。1844年11月7日，阿礼国继任后，即着手在鼓浪屿修建第一座领事楼房。历任的英领事虽住在鼓浪屿，却在厦门道台衙门办公，直到1863年，才最后搬到鼓浪屿。1870年，再在鹿耳礁建筑两幢二层洋楼，作为办公室，并附设监狱。同时，在顶鹿耳礁建筑一座领事公馆，在田尾路建筑一座副领事公馆。

英国历任驻厦领事，见附录（七）。

1936年，驻厦英国领事升格为总领事。解放前最后一任是副领事史溢民。

英国领事馆雇用华人职员3人：翻译、打字员、汉文抄写员。翻译经常与领事接触，有时并代领事检验英商进出口的船

只。这个翻译，自1925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直由丁锡荣担任。

美国领事馆：

1844年，美国先在鼓浪屿球浦边建立一个办事处，代行领事职权，到1865年才在三和路建馆。1930年间就原址翻建大楼，楼下为办公室，楼上为领事住眷。历任领事，见附录（七）。

美国领事馆华籍职员5人：翻译、通译、会计、出纳、打字员。翻译（兼教领事学中文，一般称“师爷”）一职长期由许绍琪担任。同文书院毕业的陈清篪，也是该馆的老翻译。

法国领事馆：

1860年在鼓浪屿田尾海滨建馆，后来移到黄仲训的楼屋（也在田尾）。历任领事，见附录（七）。

华人职员第一把手是林芳泰（后由其子林联鹏继任）。

德国领事馆：

1870年在英国领事馆毗邻建馆，并在旗尾山建领事住宅（已废）。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该领事馆撤销，领事也撤回。历任领事，见附录（七）。

据说华人职员有当过汉文文书的林古徒。

日斯巴（西班牙的旧译名）领事馆：

19世纪50年代前后，西班牙在鹿耳礁建立领事馆（即新建天主堂边的主教公廨）。

1852年间，由德滴（英国人，德记洋行老板）兼任领事。历任领事，见附录（七）。

1898年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馆务撤销，委托别国领事代理，到1909年10月10日，改归西班牙驻沪总领事兼理。

日本领事馆：

1875年建馆，址在鼓浪屿协和礼拜堂（现市第二医院礼堂）附近。1896年3月7日，开始在该馆附近（现编鹿礁路24号）兴建

新馆，于1897年落成。楼下为办公室，楼上为领事公馆和会客厅。1915年，又在该馆内附设警所、监狱和拘留所。1916年11月5日，借口所谓“协助中国政府维持地方秩序”，另在厦门梧桐埕分设警部。1928年，在该馆右侧又增建两幢大楼，其中一幢楼作为警察署，内有刑讯室、监狱；另一幢二层楼作为领事馆和警察署人员宿舍。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同年8月31日，该馆奉令率日人和日籍台湾人撤退。1938年5月11日，日本占领厦门，27日重新在厦门鹭江道（原海港检疫所）大楼复馆并设警察总署，原鼓浪屿警察署改为分署。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该馆因避美机轰炸，迁往厦门深田路。

日本总领事馆下分本馆与警察署两大部分。本馆除总领事外，还有副领事二名，下又分政务、监理、经济、司法、庶务、会计、文书、电信等八个系；警察署设署长一人（受总领事节制），下分警务、高等（即高等特务系统）、保安、司法四个系和鼓浪屿警察分署，以及各区“出张所”（相当于派出所），全署警官几十人。

该馆不雇用华人职员，历任领事，见附录（七）。

荷兰领事馆：

荷兰为了在厦门大量招募华工，前往其殖民地苏门答腊、日里开辟烟草种植场，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6月间，正式在厦门设立领事馆。在此以前，1852年间，由德记洋行老板、英国人德滴兼任领事；同治年间，由德商宝记洋行经理代理领事。1925年安达银行来厦营业，即由该行经理兼任领事，1937年该馆随同安达银行迁来鼓浪屿中华路正道院。历任领事，见附录（七）。

民国后，华人职员第一把手是黄和源。

比利时领事馆：

该馆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历任领事，见附录（七）。

奥地利领事馆：

馆务开始时间，大约与大北电报局创办时（1869年）接近。初由法国领事高班、笪满、亚伦、马家辉、奢士利等代理，1946年起，改托英国领事代理。

丹麦领事馆：

光绪年间建，领事由别国领事代理。名单见附录（七）。

挪威领事馆：

馆务开始时间在19世纪50年代。1852年间，由德滴兼任。以后，托英商和记洋行经理史密士代理。清光绪年间曾一度委托荷兰领事屈汝试兼办。

葡萄牙领事馆：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建馆，一向委托英国领事代理。《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中没有该国的领事或代理领事签字。

瑞典领事馆：

建馆时间不详。1902年签订《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时，由荷兰领事高士威兼代。

（二）英、德谋设“工务局”

外国侵略者企图占有鼓浪屿为租界的阴谋，可以远溯到鸦片战争期间。

《20世纪香港、上海和其他商埠志》的总编辑、英国人莱特有过一段自白：“从前英国人曾在（鼓浪屿）岛上经商，总认为本岛是一战略据点，会划作英人居留地。不料《南京条约》谈判时，因种种原因，未向满清皇帝提出租界的要求，因而英人要久留鼓浪屿，厦门满清地方政府极力反对。”虽然莱特没有阐明“种种原因”的具体内容，但他却曾透露过其中原因之一，据说是“由于鼓浪屿的不卫生”，使它幸免于鸦片战争期间沦为英国租界地。事隔不久，当英国侵略者发觉“景色秀丽的鼓浪屿和建筑物的粉饰，象欧洲南部的城市一样，并成一幅悦人心目的图

画”，认为是“适合（洋人）居住的地方”，很后悔在《南京条约》谈判时，“没有向满清政府施加压力”、“提出租界的要求”。但是，英国侵略者的野心是不会就此稍戢的。1844年11月7日，领事阿礼国一上任就不管《南京条约》有无规定，强行在鼓浪屿兴建一座领事馆，作为变鼓浪屿为它的租界地的第一步。继之，又趁太平天国时期闽南小刀会占领厦鼓建立农民革命政权时，借口“护侨”，命令军舰“赫米斯”号和“比藤”号前来，公然声称“鼓浪屿在英炮舰保护之下成为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另一次是在1864年，当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率部南下漳州时，仍然要弄“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故伎，电令“燕子”号、“凡拿斯”号、“弗兰玛”号和“巴士达”号等五艘军舰分别从香港、福州赶到鼓浪屿，并非法组织英国侨民成立所谓“义勇队”。但由于各国侵略者之间存在矛盾和中国人民的反抗，英国侵略者这两次武力独占鼓浪屿的阴谋均不能得逞。

英国侵略者企图独占鼓浪屿未遂，德国侵略者也曾妄想单独攫取鼓浪屿为它在中国的侵略据点。

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一些德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就一再讨论在中国沿海掠夺一块土地，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的计划。制造这个计划的舆论，先在官方的《星报》刊载，接着，又在《北德公共日报》、《福斯时报》和《地球仪》等报刊陆续发表。德国侵略者提出的计划，除想占领我国的台湾或海南岛或舟山外，还想吞并厦鼓，使它成为类似澳门或香港。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1870年4月2日，北德同盟首相俾士麦在一件亲笔签署的训令中指示驻华公使李福斯，要他和中国政府谈判关于“在中国海岸中心地点或在与该海岸附近的岛上”取得一个海军站的问题。在这件训令中，俾士麦着重指出：“海军当局主要认为紧靠厦门的鼓浪屿岛和舟山岛上定海附近的一片土地，是特别适宜于建立海军仓库的地点”。接着，德国的海军上校瞿